

延安时期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的 曲折进程及其当代启示

金民卿, 张琳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开始清算教条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其间经历反复的思想交锋,科学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的历史启示我们:清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领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形成、维护和发挥核心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关键词: 毛泽东;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条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5-0034-08

The Intricate Processes of MAO Zedong's Liquidation of Dogmatism in the Yan'an Period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JIN Mingqing, ZHANG Linlin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Liquidating errors of dogmatism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m. MAO Zedong started to liquidate Non-Marxist views of dogmatism after arriving in Shanbei. With repeated observa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MAO not only explained two fundamental issues scientifically: what kind of Marxism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how to insist on Marxism, but also liquidated left-leaning dogmatism thoroughl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arxism's historic leaps. Accordingly, the history of MAO Zedong's liquidation of dogmatism has given u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s: firstly, liquidating Non-Marxism is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secondly,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is the important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thirdly, leader's subjec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收稿日期: 2018-01-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 2017 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研究”(编号: 17JDSZK021)

作者简介: 金民卿(1967-),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秘书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势学科”负责人、创新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

张琳琳(1980-),女,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Marxism in China; fourthly, it is essential to form, maintain and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Key words: MAO Zedong; XI Jinping; Marxism in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gmat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教条主义的反动,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教条主义长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并曾经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要从思想上彻底清理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为此,毛泽东从到达陕北之后就逐步开始清算教条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其间经历反复的思想交锋,才完成批判错误路线及其思想根源的任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清理教条主义的曲折进程和重要经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和清理错误思想

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多次右的和“左”的错误。陈独秀时期主要是右倾错误,只要联合不要斗争,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犯了关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害。为此,必须从理论上深刻剖析教条主义的危害,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正轨、顺利发展。这是长征结束后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初步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深刻历史教训,揭示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首先,通过批评关门主义初步清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从军事上对中央苏区后期的“左”倾错误做了初步批判,指出当时军事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但对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等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深入批判。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从思想上批判和清理历史上的路线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党中央就开始对政治路线进行调整,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策略策略,从理论上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变革问题,并初步清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继续。

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是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种革命急性病的“左”倾思想的主要观点和体现是:“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对于这种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他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形象地称为“孤家寡人的策略”,看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套幼稚病”。关门主义“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1](P154-155)]基于此,毛泽东坚决地指出,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对“左”倾路线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只是作初步批判而没有展开,准备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充分展开。他明确指出,对于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等到将来再说不迟。当时他根据党内干部思想的实际情况,着重从批判关门主义错误入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扫清障碍。

其次,剖析“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花费了巨大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如

《孙子兵法》等,以及西方的《战争论》等著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基本经验,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背后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是照搬照抄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考虑、不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只是机械地照搬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结果,“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1](P186-187)}

这种“左”倾错误,在本质上是主观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P206)}

再次,揭示“左”倾错误的社会基础和认识论根源。

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指出“左”倾错误的表现和危害,而且从解决问题、避免错误重现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左倾错误的社会 and 认识根源。他指出: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二是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1](P212)}这些理论阐述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左”倾错误。

总之,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做了初步总结,揭示了“左”倾错误的实质、危害以及社会和认识根源。当然,要更加深刻地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需要更深入地从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上加以剖析。为此,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哲学著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深入反思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军事斗争上的深刻教训,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剖析错误军事路线的深层原因。但是,由于革命实践的发展和多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清算没有系统展开,直到延安整风时期才得以实现。

二、清算教条主义思想的工作遭遇了很大阻力

克服和彻底清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回答这一大问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下功夫,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而这正是延安整风的出发点。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得到了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步达成共识。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时,毛泽东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教条主义。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2](P658-659)}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把清理教条主义提上重要日程。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又没有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部分党员干部对熟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但对具体国情缺乏了解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论判断和鉴别能力,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崇拜心理。中共成立后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而共产国际的独断作风要求中共只能按照它的指示行事,导致一些人往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不可更改的圣旨。由此,教条主义成为党内长期存在的传统,彻底清理这种错误思想需要长期努力,在实际工作中也往往遭遇不同程度的阻力。

1940年3月,就在全党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潮之时,王明(陈绍禹)把他在1931所写的《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3](P590-591)}这本小册子是集中反映“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王明把它在延安出版并要人们学习,一方面表明他本人对“左”倾教条主义并不认错,并希望人们根据他的著作来理解党的历史,公开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对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依然模糊,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很大,彻底清理的阻力并不小。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提出要总结和清理过去的错误。他特别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这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要有些修改:“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绝对主义,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4](P236-239)}对于这些经验教训一定要加以总结。

然而,会议上,张闻天等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说法表示不能同意。这就是说,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上,高层领导之间还存在分歧,对于清理教条主义错误的工作还有不小阻力。这些阻力表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相当深厚。也正因为如此,清算教条主义就显得更加紧迫。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断上升到党性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看来,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切了解,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他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在编辑农村调查文集时把矛头直接对准教条主义,突出地强调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号召领导干部大力开展调查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教条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强调必须打倒主观主义,唯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抬头,革命才会胜利。但是,这个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予以重视。这再次说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之深。为此,毛泽东决定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加大清理教条主义的力度。

三、形成清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在毛泽东的提议和领导下,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上,在高级干部中达成了清算错误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基本共识,毛泽东还提出了清算的基本思路。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相比较来说,主观主义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则表现得更为严重,形态更为完备,统治时间更加长久,结果也更为悲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5](P372)}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苏维埃运动后期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等方面的表现。这就深刻揭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质、表现、危害、原因。

会上,毛泽东结合党的历史再次强调了清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重要性。他说:1932年到1935年12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届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还相当存在着;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必须要进行彻

底清理。为此,他在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之后,列出了16条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这个讲话表明,毛泽东对于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思路。

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高级干部对苏维埃后期的路线错误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于清算主观主义有了基本共识。张闻天、博古等28人次在会上作了发言,反思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讨论了反对和清算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意义,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张闻天讲道,“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6](P313-314)}博古讲道:“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7]王稼祥在总结主观主义的根源时讲道: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8](P326)}

这次会议前后,毛泽东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整理,留下了两份重要文献。一个是《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系统批判了“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另一个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该草案指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在形态的完备上、时间的长久上、结果的严重上,都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时期的错误。草案还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等方面做了分析。^①该草案还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军事路线问题、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草案后来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被作为蓝本。显然,毛泽东对于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形成党的决议。

但是,这项工作遭到了王明的变相抵制。他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路线错误,但没有作任何自我批判,并把责任完全推到博古等人身上,实际上是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10月7日,王明在同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谈话时,不但回避自己的错误,反而攻击中共中央抗战以来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甚至表示要同中央争论到底。因为王明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对时局的原则性认识,会议决定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路线错误,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工作暂时终止,到1943年9月才又进一步展开。

四、深入批判和系统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为了更好地理清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深刻总结教条主义的历史教训,1941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任弼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集中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在党的路线斗争和主观主义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深化,进一步讨论和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集中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重点批判和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统一;在这两个宗派主义中,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主义是主要的,破坏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共产国际来吓人。对于清算批判教条主义的目的和方法,毛泽

^① 该草案指出: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策略任务的提出及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东特别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整思想而不是整人,要治病救人而不能把人整死;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党内、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在会议小结时,他又谈了两点意见:一是团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要团结的,但要弄清路线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二是党内斗争的方法,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斗争方法。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有些过火言辞和不准确的方面,但是抓住了主观主义的两个形态,并把教条主义作为根本,明确了清算主观主义的重点和正确方法。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围绕着会议主题相继发言。刘少奇提议要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以党内文件形式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朱德指出王明教条主义只知道外国而不知道中国,从实际出发是正确的而从教条出发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理论懂得少、容易作教条主义的俘虏。周恩来指出王明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后明确提出:遵义会议以后和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王明等人顶着共产国际和马列主义的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经验宗派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和迷惑。他再次强调,清算错误的目的是既要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央向王明传达会议精神,王明由妻子孟庆树代笔致信毛泽东和中央,表示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改造思想意识,纠正教条宗派主义错误。

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达成一致认识,辨清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在思想上清理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接下来,就是要形成党内决议,把领导层的这种思想认识进一步推向全党,在全党范围内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

经过了长时间努力,集中全党智慧,形成历史决议,彻底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时机已经到来。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经过一年努力,数易其稿,反复讨论修改,1945年4月20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9](P952-1003)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对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及其思想根源的彻底清算,使全党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稿最初由任弼时执笔,以毛泽东在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底稿,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吸收了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草案稿于1944年5月完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胡乔木作了较大修改。之后,任弼时又在胡乔木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随后,胡乔木又起草了一个稿子,张闻天根据中央决定对决议稿做了修改和补充。决议起草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高度关注,不仅在指导思想、工作方针上给予直接指导,而且亲自动手做了7次修改,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例如,决议稿的名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他修改时确定的,决议稿的第一部分是在1945年4月7日增加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许多干部以及七大代表都参加了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谈道:“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10](P295-296)

《决议》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全面阐述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的和右的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着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清理。《决议》对“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本质,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①党经过了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

五、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正是通过系统地清理教条主义错误,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实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并产生了深远的实践和理论影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着新的重大历史责任,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必须以新的精神状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回顾和总结毛泽东清理教条主义思想的历史和经验,就是要从这一段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发。

第一,清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来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彻底清算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高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教条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曾经长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带领全党进行艰苦的努力加以清算,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理论生态。

当前,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同样也要有良好的文化理论生态。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当前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一些人不考虑时代环境的变化,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理论妄加批评,甚至提出要照搬“文革”时期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当代中国发展;一些人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制度特点,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来评判当代中国实践,用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来指导中国的治国理政,用西方经济学思想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甚至为西方敌对势力张目。这些思潮带有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如果不加以清算就会给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带来重大影响,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我们也要像当年毛泽东清算教条主义那样,清算当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第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1](P148)}这个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和基本规律: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所谓思想交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和反对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在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毛泽东领导的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就

^① 该决议还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

是这种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和纠正,是一个持久的、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为集中代表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和反复。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一些人打着不同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发扬毛泽东当年清除教条主义的精神,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持久战,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批判和清理各种假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力,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领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党的领袖在理论创新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主导作用,因为他们具有特别的政治素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深刻把握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汇集、提升和展示理论家的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新的思想理论并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毛泽东在清理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坚定意志和持续努力,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教条主义错误难以得到比较彻底的清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难以在全党形成共识并发挥行动指南的作用。因此,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形成核心、维护核心,充分发挥核心的思想引领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需要坚强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集中集体智慧、形成理论创新成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实践飞跃。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阶段呈现新的特点,新的问题需要做出科学回答,这个时候也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创新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决定,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毫不动摇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J].党的文献,1994,(1).
- [8]王稼祥.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郭荣华)